

传统文化与中国大学的特色

○ 刘海峰

〔内容提要〕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对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不少影响。本文从近代以来大学教育的改革入手,论述了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国大学在学习外国、招考方式、办学体制等几方面的特色,指明了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大学的民族性。

〔关键词〕 传统文化 中国大学特色

〔作者简介〕 刘海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邮编:361005

一、前言

大学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大学教育要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另一方面,大学又可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服务。就文化层面而言,大学的发展会更新、创造文化,促进文化的繁荣,同时,大学的发展也会受到文化的制约和影响。经济、政治对大学教育的影响是显性的,容易为人们所察觉与把握。而文化对大学教育的制约与影响则是隐性的、潜在的,较不易为人们所认识,但它的影响同时又是深刻的、长期的。

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之一,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在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和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中国古代大学已形成一些与西方大学有所不同的特点。直至现代,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大学还有不少影响。本文在简略回顾近代以来大学教育改革的基础上,从几个具体方面论述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大学的民族性。认识传统文化与中国大学特色形成的关系,会使我们在研讨大学教育改革时不仅考虑经济和政治条件,而且顾及传统文化这一“无形之手”。

二、模仿外国与文化制约

古代中国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是独自创发并在几千年中逐

渐积淀传承下来的,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个性:非宗教的具有浓厚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儒家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有别于西方的“智性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道德教化,且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形成了一种“趋善求治的伦理政治型文化”^①;讲求“和为贵”的和谐精神,强调人际关系的协和……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和渗透力,在近现代还顽强地影响中国大学的发展。

大学教育的发展有其传承性。中国自从清朝末年被动地打开国门之后,对西方教育也经历了一系列排拒与接纳、抗拒与移植的矛盾演变。作为近代化“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是从外国引进的,具有产生迟、发展快的特点,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走过了欧美国家数百年的发展历程。1902~1904年诞生的中国第一套近代学制“壬寅癸卯学制”吸纳了以日本为中介的西方近代教育的基本精神,几乎原封不动地移植了日本的近代学校制度。但在全盘照搬外国大学教育模式时,传统文化还是发挥其一定的影响力。学制的主要制定者张之洞、张百熙以中体西用为主旨,对中学与西学两种差异极大的知识体系作彼此协调的设计,目的在于将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科技知识有机结合起来。在《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大学堂分

为八科,首科便是经学科大学,其中又分为周易学、尚书学、毛诗学、春秋左传学、春秋三传学、周礼学、仪礼学、礼记学、论语学、孟子学、理学十一门科目。当时日本学制中大学只有文、法、医、格致、农、工六门,而中国将商科从法科中独立出来,又特立经学一门,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当时的立学宗旨为:“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谙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②清末学制力图将新教育纳入传统体制之中,过去人们通常以批判的眼光指出大学设立经学科是为了维护封建思想和三纲五常,实际上张百熙等人所构想的这种分科大学也含有继承传统、保存旧学的用意。

民国初年(1912~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以清末的癸卯学制为蓝本,并作了一些改进,如各级学堂均改称学校;大学设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取消经学科;通儒院改为大学院;废除读经课和清末不合民国宗旨的教科书;取消各级学堂毕业生奖励科名出身的规定等等。应该说这些改革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但总的看来比清末学制更少中国特色,或者说是更接近日本学制了,如大学院即照搬日本名称,在专科一级还设有商船专门学校,也是典型的模仿日本的产物。

文化教育落后国家在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模仿别国的学制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人类文明的传播总是从先进国家传入落后国家。唐代中国的物质和制度文明曾广泛地影响过日本,至本世纪初,比中国先行一步吸纳西方近代文明的日本反过来又向落后的中国传播西方学制。就像物理学上浓度高的液体必然向浓度低的液体渗透一样,文化的传播遵循的也是同一个方向和原理。因此,在文明落差颇大的情况下,西学东渐是一种合理的历史流动。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教育界也有不少人主张“打倒孔家店”,摒弃旧传统,杜威、孟禄、推士、麦柯尔等美国著名教育家来华讲学后产生轰动效应,而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张伯苓等一批归国留美学生走向重要行

政岗位或有重大社会影响,促使中国将教育改革的参照重心由日本转向美国^③。1922年诞生的新学制采用美国的“六三三四”制,大学和中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意在培育和鼓励学生个性自由和竞争意识。然而,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同,尽管中国社会采用了美国式的学制,但却难以吸收这一学制同时带来的教育精神。不少人认为中学阶段实行选科制与学分制削弱了中学教育的质量,影响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家长认为子女读书没了规矩,教师认为学生变得自由散漫,管理人员责备学生“放浪无纪”。总之,选科制与学分制不适合中国国情。结果,国民政府进行学制调整,于1932年颁布的《中学法》中规定中学全部取消学分制,实行学时制。在高中阶段取消选修课,加强基础课。而1931年颁布的《学分制划一办法》则规定高等学校一律实行学年兼学分制。这一变动充分反映出民族传统心理和思维习惯对教育改革的深刻影响。

另一个典型事例是1927年推行大学区制的努力受挫。该年6月,国民政府采纳蔡元培等人的提案,依照法国教育行政体制,实行大学区制,公布《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组织法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在地方则设大学区,以省为单位,每省设立国立大学一所,总管本省内一切学术教育事宜,并先在江苏、浙江两省试行。蔡元培要把教育部改为大学院的目的是为了矫正教育部的官僚习气,促使教育行政学术化,保持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政治影响力无所不在的国度中,在“伦理政治型文化”的传统氛围中,蔡元培的设想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大学区制试验不到两年便被取消,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仍沿袭旧制。大学区制在政治民主、教育普及的法国可以行得通,但照搬到中国来却脱离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实际,由于理想过高,实行以后不仅未能使教育行政学术化,反而使学术机关官僚化,非但未能提高效率,反倒使行政效能日趋低落。“大学院组织之最大缺点,即为过重理想而忽视事实。”^④结果此次用意良好的改革成了昙花一现的试验。

借鉴外国教育经验应当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如果一味的模仿某国教育,甚至提倡“某国化”,把本国教育的民族性都给“化”掉了,则不足取也不可能长期行得通。50年代初,中国大陆掀起了学习苏联的浪潮,认为苏联大学教育从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方法到教学管理等各方面都十分先进,于是全面地、大规模地学习苏联,进行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改革。此次调整改革使学科专业结构趋于合理、大学规模扩大、办学效益有所提高、区域布局相对均衡,但迫使理工分家,此后只有苏联模式的文理科综合大学,没有各国通常有的多学科的综合大学,而且专业划分过细过窄,不利于学科的互相渗透和交叉发展。当今中国大陆不得不又进行专业改革,合并一些过专过窄的专业,大学也出现合并和联合办学的改革,这可以说是对50年代初学习苏联的一种反动。从长期的实践看来,中国的大学教育最终没有成为从属于苏联模式的体制,既有政治经济的动因和时代变迁的影响,也有传统文化的无形制约作用。

三、中国大学特色举例

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教育经历过仿日、学美、效法、学苏几个阶段的变迁,有的阶段几乎还是全盘仿行某国的教育模式,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仍然在许多方面保持了自己的特色,从中可以看出传统文化与大学教育的深刻联系。以下略举数端。

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在中国出现,应该主要归因于传统文化的潜在作用。从隋唐直至明清的1300年间,中国实行科举制考试制度以选拔人才任予官职。科举时代,在长期的考试实践中形成了在考试成绩面前人人平等(当然指相对的平等)的公平竞争观念,也在中国形成了注重统一考试的传统。科举废除后,清末民国时期,各高校一般独自招考学生,但5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和台湾不约而同地走上了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的轨道。在大陆一片学苏的热潮中,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却是一个例外。因为实行计划经济的前苏联恰恰从来没有实行过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而中国大陆于1952年在总结抗战后国统区

国立公立高校联合招考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统一高考制度,不能不说相当程度上是传统文化在起作用。而且,1949年以后,台湾虽与大陆互相隔绝,但也在1954年开始实行大学联合招生考试制度。

中国大陆和台湾政治制度迥异,经济发展程度也有相当的差距,为什么却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走上统一考试之路,在世界各国各地区中形成最为相似或基本相同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其原因根本还应从传统文化去分析。

海峡两岸具有相同的传统文化,大陆的高考和台湾的大学联考制度既受传统文化中大一统观念的促成,又受实行科举制的1300年间所形成的公平竞争观念的推动。这种在考试成绩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竞争观念,是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难能可贵的一个闪光的方面。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庭和人际的协和,一贯主张“和为贵”,这对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传统文化以家庭为本位和讲究五伦关系,具有一种“社会取向”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这自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同时它又使得中国传统的家庭和亲友关系,可能无限膨胀,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使人们相信人际关系至关重要,人情高于一切。因此,托关系、走后门的不良风气盛行,以致许多人常常身不由己地陷入“人情困境”之中。古往今来选拔人才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说明,只靠推荐是难以排除人情干扰的,各高校单独招考也是较难做到保密和公平客观的,而统一考试则是以法制的精神来克服传统文化中人情泛滥这一消极面的有效手段。在各高校自行招生时期,各校遭遇人情困扰很大。实行统一招考之后,明显地收到公平竞争、择优选才之效。因此,50年代初中国大陆和台湾推行高校统一招考制度,一方面是由于考试制度发展的内在动力的驱使,而比世界上各国更早更侧重采用统一考试分数作为高校招生的依据,则只能解释为主要是受科举考试的启示和传统文化的影响^⑥。

中国大学招考方式的形成和维持还与重视教育、读书至上的传统有关。中国历史上一直有重视教育、希望靠读书出人头地的传统。从好的

方面来说,此传统促使人们尊重知识、积极向学;从消极方面来说,则养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加重了学历主义、升学主义的盛行。受此传统影响,一些家长再穷也要设法供子女上学。当今中国社会“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还有不同程度的遗存,许多人觉得读书越多越有前途,于是纷纷挤向高考或大学联招这道窄门^⑥。在升学竞争相当激烈的情况下,要提供公平竞争的管道,较为可行的还是统一考试方式。因此尽管高考或联招有颇大的弊端,还是在不断的批评声中延续下来,长期成为大学招生的主要管道。

学生住校方式也是中国大学一大特色。中国古代将进入官立高校进学视为入仕的预备阶段,学生因而具有“准官员”的身份和地位。入学意味着脱离了普通老百姓阶段,变成士、农、工、商四民中士阶层的一员,不仅可以免除赋役负担,而且还常可享受官方供给的免费食宿待遇。尤其是中央国子监,学生基本上住监,官方不仅提供食宿待遇,而且有的朝代监生的衣服、冠履也由官府按时分发。学生住校的传统一直继承下来,清末民国时期大专以上学校学生多数实行住校方式。1949年以后,大陆的大学一般都沿用此法,要新办一所大学或扩大某一所大学的招生数,首先考虑的便是学生宿舍够不够住。学生住校(包括教师住校)使学校的后勤支出负担较重,近年来虽一直强调要改变大学办社会的状况,促使后勤社会化、住宅社会化,但学生住校方式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个中原因有历史遗留问题和方便学生的用意,但也与强调对大学生要加强管理约束的传统观念相关。限于篇幅,于此不再展开论述。

传统文化对中国大学特色形成起作用的另一个显例是部门办学体制。在传统的政治型文化背景下,政府机构在整个社会上地位重要,职能繁多。隋代律学即不归国子监而由大理寺(大理寺)管辖,唐代在国子监所辖六学的直系高校以外,还有许多由中央各业务行政部门开办和主管的旁系高校;如崇文馆由东宫主办,弘文馆由门下省主办,集贤书院由中书省主管,太常礼院由太常寺主管,医药学院由太医署主管。这种学校管理体制在当时世界上独具特色,而且一直影响

到近现代。中国第一所近代性质的高等学校同文馆,便是由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海关开办和支持的,此后的洋务学堂多数也属于部门办学。本世纪初,交通大学的前身上海南洋公学还一度改为“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从校名便可知是部门所办高校。正是有长期的部门办学传统,所以大陆在50年代学习苏联时很方便地大量采用部门办学体制。现在为解决大学行政条块分割问题,正逐步减少各级政府部门所办大学而转由中央或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管理,但部门办学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管理体制在将来也不会完全消失。

以上仅举数例,便足见文化背景不同,即使是长期全面仿学外国大学教育制度之后,中国大学教育也还保持一些自己的特色。有如淮橘为枳,诞生于异质文化中的西方大学制度引入中国,也不免要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本土化、民族化。

四、结论

大学教育国际化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中国更是积极地提倡教育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开展合作研究与联合办学,“与国际接轨”便是热门话题之一。要使中国的大学教育赶上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还需大量借鉴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大学制度和办法。不过,在学习外国经验时应该考虑中国的国情,在西方行得通的制度,照搬到中国来却不一定行得通,比如在重人情、关系、面子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就无法采用“宽进严出”的方式。“国际化”更不能变成“某国化”^⑦,否则,中国的大学教育会丧失民族性,“化”成一种没有特色的它国教育的附庸。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中国的大学理应具有自己的一些特色,而且也必定会具有一些特色,当然我们希望能够消除落后的特色,而葆有一些美好的特色。

注:

- ①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80年10月,第324页。
- ②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见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10月。

(下转39页)

的形成、完善时期。当代大学生从个人所处的社会座标来看,真正的人格形成应该具备三个特征:

其一,在主体意识上,不以外界支配为转移的自我需要的本体观开始形成,即他的行为动机“源”不再是出自于任何外在力量的支配,而是出自于自我利益的驱使。作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准的大学生除仍具有一般人功利性追求的共性外,还内蕴着强烈的非功利性的某些追求或欲望,如知识、真理等等,在相当时候后者则有着至高无上的意义,这就是绝大多数大学生为什么追求人存在的精神价值或精神享受要大大超过其追求人存在的自然价值或物质享受的根本所在。

其二,在思维方式上,坚持科学与理性。科学与理性是建筑在个人的独立思考、比较鉴别和较高的认知能力之上的,它完全不依赖甚至“排斥”外人(甚至权威)的思想、书本以及社会上长期形成的“约定俗成”,而大学生正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他们不但年龄年青,而且思想也同样年青,在许多事实面前,他们不是人云亦云,而是依据自己的知识和思维去独立地思考判断和价值选择,以追求内心世界的真正自由。当然,在其背后也使他们逐渐助长了“万人独醉唯我醒”和某些过份的自高自大思想意识。这是我们在思想教育中需要注意的重要方面。

其三,在行为模式上,是对社会的责任感问题。它要求一个人的行为不仅要对其自我思想负责,更要对自我赖以生存的社会负责,要勇于承担个人选择所必然产生的相关社会责任,并根据客观的社会效果不断校正主体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这样,他不仅有助于自我选择的实现,而

且对于社会的进步和他人价值的实现,都有良好的帮助作用。

七、形成完整的理想体系

大学生的理想体系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一是个人理想(包括生活、职业、道德等理想),这是最初步的理想;二是集体理想,这可以看作是由个人理想向社会理想升华的阶梯;三是国家、民族、人民的理想;最高层次的理想则是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的理想。

理想结构的层次性决定了理想形成的阶梯性。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为人类历史设计的最完美、最进步的社会,同时也是人的道德水准最高尚的社会。因而一个人由个人理想逐渐升华为社会的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这足以标志着他进入了理想的最高境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影响、阻止他去为这一理想而奋斗、去实现这一理想。个人理想对于大学生来说虽然处于理想的最高层次,但这也是理想的基础,因为一个人总是社会的人,他的所作所为就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且同时也被赋予了社会意义。如他的职业、道德等无不在影响着社会。他的情感——道德感、审美感以及理智等是组成理想体系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使理想向高层次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所以,在大学生这四个理想层次中,每一层次都是应该竭力追求的,只有把四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才是一个大学生应该具有的、完整的理想,才能形成一个理想体系,才能使大学生完成由低层次社会人向高层次社会人的真正转变。

[本文责编 任元军]

(上接 13 页)

- ③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第9页。
④雷国鼎:《中国近代教育行政制度史》,台北教育文物出版社,1983年6月,第334页及“自序”第3页。
⑤刘海峰:《传统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教育研究》,1996

年第11期,第27~29页。

- ⑥刘海峰:《变革中的台湾大学联考制度(下)》,《中国高校招生》,1993年第3期。
⑦别敦荣:《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民族性》,《教育研究》,1996年第11期,第29~30页。

[本文责编 张桂霞]